

爱德华·利文斯顿·特鲁多 (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 (1848-1915)

在试图简单地讲述特鲁多 (Trudeau) 的事迹时, 我深知这本小册子所记述的时代并没有完全涵盖他的时代; 但在我看来, 不可能不提罗伯特·科赫 (Robert Koch) 的直接遗产, 这是他在不知不觉中传给新世界的宝贵财富; 然而, 毫无疑问, 在美国播下的种子已经收获了最丰硕的果实, 下一位结核病史学家将发现那些用全部生命能量最真实地实现了这一伟大发现的人, 他们发现了远非单纯的细菌, 而是导致结核病的杆菌。我觉得自己应当向未来的史学家讲述下列人物的事迹: 西奥博尔德·史密斯 (Theobald Smith)、爱德华·鲍德温 (Edward R. Baldwin)、Leroy S. Gardiner、艾伦·克劳斯 (Allen K. Krause)、George E. Bushnell、Eugene L. Opie、阿诺德·赖斯·里奇 (Arnold Rice Rich) 和其他许多人; 但他们都代表着当今时代, 因此不在此书涵盖的时期内。我不得不依依不舍地跟他们告别, 并希望有一个比我更好的记录员, 能够将他们如此灿烂光辉的名字传给子孙后代。

但我觉得, 特鲁多的事迹, 虽然如此接近我们自己的时代, 仍然必须与过去的伟大历史人物的事迹相提并论; 必须与所有 *开创* 新疗法的人并驾齐驱; 必须确定科赫学说在医学界的渗透是多么广泛和深入。

特鲁多于 1848 年 10 月生于纽约。他有着严格的医学血统。然而, 他的父亲 James Trudeau (詹姆斯·特鲁多) 博士不仅是一名医生, 而且还是一名士兵。内战爆发后, 他成为南方军队的一名军官, 受了伤, 被带回新奥尔良, 在那里他或多或少恢复了健康, 并在去世前能够从事自己的职业。特鲁多在他的自传中说道: “我父亲对大自然和狩猎的热爱是一种真正的激情, 这种激情毁掉了他在新奥尔良的职业生涯, 因为他经常因为狩猎探险而缺席自己的工作。” 这种激情使他与一个印第安部落一起生活了两年, 他把这种激情传递给了儿子, 以此来减轻死亡带来的痛苦, 而死亡当时似乎离他很近; 直到他有了重大发现, 他发现结核病不一定是一种致命的疾病, 即使患有结核病, 一个人还是可以继续生活并取得发展, 前提是在伟大的自然疗法 “休息” 所允许的界限内开展生活中的各种活动, 所有结核病患者如果想存活, 就必须服从这项规则! 特鲁多说道: “作为他的儿子, 我也同样热爱野外生活和狩猎, 因为 1872 年患上结核病时, 尽管我的朋友和医生们都提出了紧急抗议, 但这种热爱还是驱使我把自己隐藏在阿迪朗达克山脉……目的是在大森林里过一种露天的生活, 与大自然和

我所爱的人独处。”特鲁多的母亲是塞菲斯·伯杰（Céphise Berger）小姐，她是法国医生 François Eloi Berger 博士的独生女，François Eloi Berger 出身于一个医生世家；属于世袭的医生，家族的医生传统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特鲁多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就分居了。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第三个孩子是特鲁多，他和哥哥一起，陪着母亲和外祖父母去了法国，那时他才三岁。他的姐姐陪着父亲去了新奥尔良。就这样，这个家庭被拆散了，年轻的特鲁多和他的外祖父伯杰（Berger）博士住在一起。伯杰医生当时已经从纽约的一个大型诊所退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巴黎。此后不久，特鲁多夫人与丈夫离婚，并与一名法国军官 F. E. Chuffart 上尉结婚，她与 Chuffart 一直住在枫丹白露，直到 1900 年去世。

因此，特鲁多来到巴黎接受教育，并从 1851 年到 1865 年一直呆在巴黎。1865 年，伯杰博士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外孙特鲁多和哥哥举家回到了纽约。在巴黎的 15 年里，他被送进一所学校，据他的日记记载，这所学校会对一个男孩性格的形成产生很坏的影响。“怯懦、撒谎、行骗和各种各样的欺诈”在男孩子中很流行，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老师们很少管这些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中，竟然出现了一个最勇敢、最诚实、最真诚的人，这是多么令人奇怪啊；也许正是种族的差异导致了这一现象；他是一个美国人，在许多法国学者中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但他却不能追随！

伯杰博士在巴黎的家位于马蒂尼翁街，这是一幢典型的公寓式住宅，有一个马车门廊，马车可以从那儿开过去，并在那儿转弯，也可以在后面的大院子里等候。一楼一直由法国政府为法国陆军参谋部的一位将军租用，他就是巴赞将军（General Bazaine）。特鲁多的外祖父也因为皇帝的恩宠而被选中，并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这使得他的纽扣孔上别着绶带；但是，当被问到绶带是干什么用的时候，他总是对他的外孙说：“为了让好奇的人开口，我的孩子。”

然而，孩子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美国国籍，北方男孩与南方男孩之间有着热烈的竞争意识，当地池塘中竞争对手船只之间的竞赛表明了这一点，南方人并不总是从人数更多的北方人那里得到公平的待遇，年轻的特鲁多和哥哥就是公平的样本。事实上，爱德华在一位著名的南方外交官后面发射了他的弹弓，击中了外交官的背部，他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或者更确切地说，击中了他的外套！“一只沉重的手抓住我的衣领，一把大伞当啷一声落在我的头上和肩上。我飞快地挣脱外套跑开了。我转身往回看时，看见了那位激动的绅士，气得脸色发紫，用伞敲打着我的外套，还听见他对孩子们说的那些讽刺挖苦的话，男孩子们这次都吓得不敢笑了，保持了一段恭敬的距离。”他并没有因此受到严苛的鞭打，而是在几天后被外祖父带到大使馆，说他就是那个“击中斯莱德先生”的小伙子，他因为表现良好受到了称赞——但他再也没有拿回他的外套！

他回到美国时，已经 17 岁了，他很高兴地发现男女之间的关系比在法国时要自由得多。“发现自己一下子就与表妹以及她们的女性朋友们亲密地、无拘无束地玩在一起，冬天和她们一起散步、骑马、跳舞、滑冰，夏天和她们一起开车、航海、划船、游泳、跳舞，这对我来说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大门，我想我充分利用了所有机会。”在一次去奈阿克的旅行中，他第一次见到了他未来的妻子，“我去找表妹米妮·阿斯平沃尔（Minnie Aspinwall），我已经安排好那天我们一起去奈阿克。我到 18 号街去叫她的时候，看见她正在跟一个身材高挑、穿着黑色衣服的年轻女子说话，她立刻把这位女士介绍给我，说这位女士是洛蒂·比尔（Lottie Beare）小姐。”他将这位女士的旅行包拎到了他表妹家，觉得这位女士她很冷淡、矜持，但正如他所说，这位身材高挑的黑衣女孩很快就激发了他“用爱使我放弃了先前在纽约迅速融入的那种疯狂的生活方式，我工作三年后获得了医学学位，并用一生的努力让自己配得上她。”

特鲁多当时以为自己会进入海军，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应该进入旧船 *Constitution* 作为一名海军候补少尉，但当时他亲爱的哥哥得了痲病，不久就去世了。特鲁多说道：“我对他的外表感到震惊，当他告诉我医生说他得了痲病时，我立刻推辞了任命，和他一起回到我外祖父的家里……那时我们没有受过训练的护士，从他 1865 年 9 月生病到 12 月 23 日去世，我一直在照顾他。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有时也睡在同一张床上，我给他洗澡，给他端上饭菜，当他感觉好一点，可以下楼的时候，我就背他上楼下楼……我的姐姐和外祖母白天经常和他坐在一起，让我出去锻炼和换衣服，但他很快就变得非常依赖我，我不得不日夜和他在一起……我记得，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周，我每晚都要喝绿茶以保持清醒，但我坚持到了最后……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结核病和死亡。”

他与挚爱的哥哥的亲密接触不仅使他了解到结核病，而且一定使他染上了某种疾病的病菌，这种疾病在几年时间内使他失去了良好的健康，并迫使他转移到截然不同的和意想不到的环境中；熄灭了他在纽约或纽约附近从事医学事业的所有希望；绝望地前往阿迪朗达克山脉的树林和湖边，最后出于结核病对杰出人物所产生的奇异影响，他决心与结核病斗争并克服它，几乎完全掌握了这种疾病，并找到了一种治疗方法，可以帮助许多人在面对结核病时生存下去！

然而，当时又是因为这种可怕疾病的本质——他想要恢复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力，做了几次尝试，但没有一次成功，他与自己完全依赖的外祖母争吵，开始过上一种非常接近放荡和轻浮的生活；最后，几乎是出于本能，他选择了显然是“刻在骨子里”的医学世袭职业。与此同时，对他的许多知己至交来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在[工会]俱乐部的朋友们对我做任何工作都没有多少信心，我记得当我向俱乐部的一群人宣布学医的决定时，丹·莫兰先生说：‘我赌 500 美元，他永远不会毕业’，但没人敢打赌！”

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下来，经过录取后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这是位于 23 号街和第四大道拐角处的一座不太气派的建筑，他在学院进修了医学、外科和病理学实践等课程，当时的病理学实践作为一门选修课，由医学主席授课。

当然，关于疾病病因的理论已经讨论过了，但那些尚未为人所知的激动人心的根本原因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特鲁多说道：“结核病也是如此。Alonzo Clark 博士教导说，这是一种非接触传染的、一般不可治愈的遗传性疾病，起因包括遗传体质特点、反常体液和各种炎症，他详细阐述了结节、淋巴结核、干酪性坏死和肺结核的不同病理学特征。”

这是非常有趣的发现，直到那一刻竟然还有人在教授这种严肃的荒谬言论，当时维勒明和康海姆（Conheim）等调查研究成果正促使人们的思想突然转向伟大真光，而且杰出的发现者罗伯特·科赫本人的发现继续促进了这一转变。真正的医学将在片刻之间展开；展开过程变得迅速起来，甩掉长期以来笼罩着它的无知的外衣；在一眨眼的工夫从一门悬而未决的艺术上升为一门进步的科学。

特鲁多对自己当时的健康状况总结如下：“虽然身材清瘦，但我体格相当健壮，非常活跃，耐力也很好。”

这种充沛的体力曾在他的亲戚和密友利文斯顿家族提议下受到考验，他们打赌说他可以在一小时内从中央公园走到 Battery。一天夜里，他在半夜时分出发，四十七分钟就走完了全程，但这种活动量对他来说太大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感到不适。这种生病的感觉也许就是这种疾病最早的表现之一，而这种疾病注定要折磨他。它伴随着一个冷脓肿的形成，在愈合之前必须进行多次手术。然而，正如他所说，在那些日子里，“这种冷脓肿与结核病的关系尚不太清楚”，也没有人向他提示这可能是一种早期症状。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他就可以通过休息等早期治疗方法来避免很多麻烦。许多年后，当特鲁多被要求在纽约向 Walter B. James 博士班上的学生就结核病问题发言时，他对他们说，“如果一名病人来就诊时患有干性胸膜炎、吐血或冷脓肿”，他们应该怀疑病人患有结核病；极好的忠告。

一直以来，特鲁多都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为了取悦她，他愿意做出任何牺牲。他决定给比尔小姐买一匹好马作为生日礼物，在利文斯顿家族一位机警的年轻爱尔兰马夫 Patsy 的明确建议下，特鲁多最终花三百美元买了一匹漂亮的、棕红色的马，这匹马最初的报价是一千美元！他非常自豪地骑着这匹马向他心爱的人奔去——但是，当他最后非常高兴地式骑时，他注意到这匹马瘸了，肩跛行，意识到自己“完了”。他不得不把马牵到岳父的教区长住宅前，向她坦白自己被骗了，无法向她展示马匹的美丽，也无法将马匹送给她。然而，比尔小姐“充满了善意和同情”，她完全弥补了他这种苦涩的失望，不久之后，这匹漂亮的骏马以 75 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才有能力购买“一种普通的有用的动物”。不管这一插曲是否推动了感情的发展，反正不久之后他就宣布了订婚，他和洛蒂·比尔于 1871

年6月29日正式结婚，特鲁多家族的一名男性穿着制服、开着借来的双门跑车将这对新婚夫妇送到了纽约，一切都尽可能地尽善尽美！“那时候我当然是无忧无虑的，远方和未来都是灿烂的玫瑰色。”

从下面的一个小故事中，我们可以想象出“玫瑰色”是怎样的场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意外地从我外祖父的财产中分得了1200美元……当那笔钱出乎意料地出现时，我觉得自己可以利用这笔钱的最自然、最令人满意的用途就是用它来买卢的马车。”“卢的马车”是一对小母马，卢·利文斯顿(Lou Livingston)过去经常用这对小母马驾着一辆轻便的布鲁斯特快跑马车；而特鲁多现在接手了它。

于是，他和他新婚的妻子驾车去了纽约，带着他那1200美元的小额遗赠，而两只聪明的小母马驾着马车欢快地跑着！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难道他得到的钱财不就是拿出来让洛蒂高兴和骄傲的吗？他说道：“我猜想，当她穿着一套最新的快跑马车服装跟我一起出现的时候，她那刻板保守的朋友和家人一定会以多么不赞成的态度看着她；但是当小母马们在拥挤的第五大道上艰难地行进，然后以240步的速度飞快地穿过哈莱姆巷时，没有人比我更自豪、更幸福了！”

第十大街和A大道的拐角处坐落着一家名叫“陌生人医院”(Stranger's Hospital)的小型医疗机构，这家医院刚刚开业，特鲁多成了医院征聘人才的众多职位的一名候选人。他很高兴地听到，就在他参加考试几天以后，他听说自己以最好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位，这使他非常高兴。他选择了只持续六个月的内科住院医师的职位。正如它的名称所指，这个职位意味着不断的努力工作，最终导致他在这家医院的工作结束时变得非常消瘦和疲惫。他对此说道：“在十八个月前通过冷脓肿确定结核菌感染的确凿证据出来之后，我的抵抗力一定很好，才能够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保持这么长时间的良好状态。”很明显，当他知道自己患了这么长时间的结核病时，他把这看作是一次“侥幸的脱险”。但当时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他离开了医院，最后在当地度过了两周的假期，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他于1871年6月29日结婚。婚后，他和妻子乘船去了欧洲，先去了伦敦，接着去了巴黎，重温了所有的旧景，然后去了瑞士和德国。“在英格兰的时候，我颈部一侧的淋巴腺有些肿大，但那时我们对结核感染的机制一无所知，所以这种症状没有引起我的警觉……第二个关于结核感染的警告就像第一个警告一样没有引起注意。”回到美国后，他们在朋友道格拉斯(Douglas)先生的庄园门口租了一间小屋，他们先前就是在道格拉斯先生的家中举办的结婚仪式，并在那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年，他在此期间试图在长岛找到一家诊所行医；但特鲁多发现，乡村的生活

有着太多的局限性，无法让他在职业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因此，在他从欧洲回来一年后，他搬到了纽约。

他成功地以自己能承受的价格租下了西街 8 号的一套合适的房子，租期为三年。他住在那里还不到几个月，Fessenden Otis 博士就向他提出了合作意向，并承诺很快就让他接替自己的职位，他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和他的朋友路易斯·P·沃尔顿（Luis P. Walton）博士在德米尔特诊所一起上了一堂关于胸部疾病的课。一切似乎都指向一个成功的未来，以及在纽约医学界的重要地位。

然后打击就来了！正如读者所观察到的那样，他已经有过两次毫无疑问是结核病的发作，但这两次发作都被成功克服了。现在他开始发高烧，这被认为是由疟疾引起，疟疾当时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地方疾病。他服用了奎宁，但这似乎对他没什么好处。他总是感到疲倦，这是他身体状况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症状，但他把这归因于城市生活的禁锢。他用自己的话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一天下午，我和沃尔顿博士一起在诊所，他坚持说我看上去病了，还给我量了体温。令我惊讶的是，体温测量的结果竟然达到了 101 华氏度。沃尔顿建议我去看詹韦（Janeway）医生，让詹韦医生检查我的肺部，但我对这个主意嗤之以鼻。”然而，后来他又想起了沃尔顿博士的意见，他说部分原因是想驳倒沃尔顿博士，让沃尔顿博士知道自己一切都好，但正如人们所想的那样，他带着一种怀疑的心情去看了詹韦医生，请詹韦医生给自己检查一下。检查结束后，接着是一阵沉默，詹韦看着他，什么也没说。特鲁多打破了沉默，说道：“好吧，詹韦医生，您没发现什么问题吗？”詹韦医生神情严肃地说道：“确实发现了问题，您左肺上部三分之二的区域出现了活跃的结核病变。”

这里有必要引用特鲁多的自传来描述他的感受。

“我想我对那个在酒吧里被告知将在某一天被处以绞刑的人的感受有所了解，因为在那个时候，肺病被认为是绝对致命的。我振作起来，尽量装作对这件事毫不在意，在感谢了医生的检查之后，我逃出了医生的办公室。当我走到外面，站在詹韦医生办公室的门廊上，我感到震惊无比。在我看来，世界突然变得黑暗起来。太阳真实的照耀着，街上充满了车水马龙和喧嚣热闹，但对我来说，世界失去了一切光明。我得了肺病——那是最致命的疾病！在我哥哥的病例里，我不是见证了肺病的所有恐怖吗？它意味着死亡，我以前从未想过死亡。我准备好接受死亡了吗？我怎么能告诉我的妻子？我才刚刚离开她，内心充满着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幸福感，而且我们的新家里还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还有我在纽约取得成就和职业成功的玫瑰色梦想！现在它们都破碎了，取而代之的是放逐和必然的结局。

即使在今天，我们在结核病防治领域拥有了丰富的经验，但突然宣布的明确诊断还是会成为完全改变生活的信号。当然，这种疾病可能不是致命的；相反，事实可能会证明，在漫长的生命过程中，疾病状态可能只持续六个月或一年。

这是 X 光诊断对一个问题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在特鲁多的时代，这个结果比现在更加凶险。然而，有些事实如果当时得到承认就好了，这样就可以考虑相关事实。特鲁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病情与几年前很快死于结核病的哥哥作了比较。他认为，既然他哥哥已经死了，他也会死的——很快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死亡的牺牲品！然而，在区分这两个病例时，仍有一些地方值得密切关注。我可不可以说说我自己的一种分类？这种分类很久以前就被遗忘，但仍然很有用，只要结核病防治官员想到使用它，它还是可以用来比较这两个病例。他哥哥的致命疾病显然是 A.3.a. 病例，其中 A. 代表以前没有疾病症状的病例，3. 表示病例已经进入高度进展型的第三阶段，a. 表示病人正在发烧。即使是在现在，这种病情几乎总是致命的。另一方面，特鲁多本人的病情则完全不同。病人至少遇到了两次较为温和的警告性发作，但病人恢复得都很好，这表明他有很强的抵抗力。他主动请詹韦医生给他检查，当他最后接受詹韦医生的检查时，他以为这次检查能使他驳倒沃尔顿对他的怀疑。直到那时，他才知道自己“左肺上部三分之二的区域”已被结核病累及。这种病例通常会被送进医院或疗养院，然后遵医嘱卧床休息，并在几天内消除所有发烧和疾病体征。这并不是说病人在这种变化下健康状况更加好转，但至少病人感觉好多了，可以开始他所必需面向的通向健康的漫长之旅。换言之，特鲁多是一个 C.2.b. 病例；一个以前有过发作史但间隔期间身体健康的病例，一个至少有一个肺健康的病例，一个在有利条件下可以控制发烧的病例。换句话说，在适当的条件下，特鲁多这类病例的健康状况最终可能会好转或甚至变得相当好。

当然，这些都是特鲁多所不了解的方面，他以为自己在劫难逃。他首先做了什么呢？他像个男人一样勇敢面对这种情况；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的妻子，当然是和颜悦色，而且很少有保留；他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搬到南方”；尽可能地待在户外；以及骑马作为一项治疗措施——根据希德纳姆（Sydenham）、莫顿（Morton）、马汀（Marten）和 17 世纪其他结核病医师的建议，更不用说盖伦（Galen）自己了，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一切都很糟糕！这类病人应该被引导去专门治疗结核病的疗养院或医院！但当时哪里有这样的机构呢？整个美国都没有这样的机构。正是因为点燃了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孕育之光，特鲁多自己才有可能第一个发现了渐进式锻炼的价值、必要时休息的价值、充足的新鲜空气的价值、工作连续性的价值，即使是狩猎、钓鱼等也会发挥相应的作用，但需要在医嘱范围内行事，一方面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健康状态说明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病人自己愿意采取哪些措施！

特鲁多准备以自己的健康作为筹码开展实验；失败了，再接再厉，发现一线曙光，继续努力；最后，根据成功的实验，他建立了美国第一家伟大的疗养院，成为美国和全世界的希望之星。

特鲁多的第一项实验是尝试医生给他提供的宽松建议，包括“搬到南方”、待在户外、试着骑马等。所有这些建议都非常好，但如果合格的医生给病人提供具体的指导，这样效果会更好，医生可以告诉病人能够“待在户外”多长时间，以及“骑马”的活动量限制等，但除了病人自己，并没有这样的医生，他显然运动过量了！由于骑马，他每天都发烧！如果他身边有一位像本杰明·马汀（Benjamin Marten）这样的早期著作者就好了，本杰明·马汀在十七世纪编写关于肺结核的著作时，建议病人骑马，但又劝告一定要适度，这类指导完全可以避免特鲁多健康每况愈下的趋势和每日的发烧！特鲁多后来又回到了纽约，第一次实验没有取得更好的结果。

在那里，特鲁多“被允许甚至被敦促”每天进行锻炼，结果他一直持续发烧，体重和体力稳步下降。他说道：“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静养是结核病人征服命运的唯一途径。”

他的朋友卢·利文斯顿尽其所能让他振作起来，并以自己的方式安慰他——这通常意味着带他去观看或参加一些体育赛事或其他活动。例如，有一次利文斯顿提出开车带他去长岛的 Union Track，去看两个人，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向一只飞行的鸟射击过，他们用一千土豆作赌注，向从陷阱中释放出来的鸽子开枪。看完这两个人的比赛后，特鲁多和利文斯顿还会参加一场“失利淘汰赛”，任何人只要选择参加，都需要缴纳 5 美元的报名费；卢·利文斯顿在射击鸽子方面是一个神枪手，他希望在这场赛事中赢得一些奖励。“H. D. Polhemus 先生……似乎对我明显的病情很同情，坚持要我带上他的一把好枪，鼓励我和其他人一起参加比赛以赢得奖金”——这是一个不了解结核病的人的典型做法——“最后我同意了”。尽管特鲁多越来越精疲力竭，并且对这件事已经完全厌倦了，但最终他连续四次赢得了比赛奖金，然后与同伴一起尽情地喝酒，他在自我祝贺后说：“我想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射击得那么好，尽管我病得很重”，他在后来记录这件事时指出，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大部分时间都得躺在床上”。

“当然，第二天我疲惫不堪，发高烧，不得不躺在床上。”于是第一次实验就结束了，结果是一场灾难。特鲁多在这个阶段似乎很绝望，他相信一切都结束了。但他的妻子很快就要给他生第二个孩子，于是他不顾医疗顾问的建议，决定留在原地，等待第二个孩子出生。“我们的儿子于 1873 年 5 月 18 日出生，一周后，卢·利文斯顿和我出发去了保罗史密斯旅馆（Paul Smith's）。”他的朋友沃尔顿博士对他帮助很大，也对他的妻子给予了很多安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被送到岳父在纽约小颈的教区长住宅接受照料之后，沃尔顿博士定期去看望她，

并让特鲁多知道她们母子的情况。“他对我的亲人们的亲切关怀和来信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我之所以选择阿迪朗达克山脉，完全是因为我热爱大森林和野生动物，而不是因为我认为那里的气候对我有任何好处。这个地方当时只有猎人和渔夫光顾，正如特鲁多所说，这里是一个崎岖难行的地区，气候严酷恶劣。但他决心只去那里，不去别的地方。“如果我只能再活一段短暂的时间，我会向往那些吸引我的环境，它似乎满足了我对休息和大荒野宁静的渴望。”就这样，他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实验，除了偏远地区的安静和不受干扰之外，他对这次实验基本上别无他求，只要其他方面没有不合适的地方，他会一直在那里逗留，直到死亡结束一切。

然而，第二次实验最终会取得成功！事情的开始都有预兆。对于一个饱受结核病折磨的人来说，去萨拉纳克（Saranac）的旅程非常艰难。卢·利文斯顿像一个忠实的朋友一样陪着他，几次劝他回去；但特鲁多很坚定，所以他们一起继续旅行。到了普拉茨堡，他们就无法立即出发了。“我一整天都在发高烧，一到 **Fouquet House** 就立刻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病得很重，身体也很虚弱，根本无法长途跋涉去保罗史密斯旅馆。”第三天，他们到达了 **Ausable Forks**，为了从那里到保罗史密斯旅馆，他们不得不在一条崎岖的木排道上行驶了四十二英里。“我休息的时候，卢雇了一辆两匹马拉的老式马车，在两个座位之间放了一块木板，还放了一个床垫和两个枕头，让我可以舒服地躺下。”

在这趟可怕的旅途中，卢·利文斯顿一定是一个很棒的朋友。读到他为照顾自己所做的一切，真令人感动。在这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人看来，他一定是上帝的代理人，他主动承担起了帮助特鲁多渡过未知之旅中的各种难关。

像特鲁多这样罹患结核病的病人，这样的旅行能在多大程度上轻松地扭转局势呢；但是，尽管如此，他至少还有机会挺过这一关，到达旅程的终点，而不必遭受必然会带来的灾难，如果他像他哥哥一样是“A.3.a.”病例的话，这些灾难将不可避免。但他已经度过了冷脓肿和宫颈腺体的双重侵袭，恢复了几乎完美的健康。尽管这次的情况要严重得多，那么他还能不能再好起来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奇迹还没有实现，但很显然他这次“情势危急”，只有他个人的勇气和对所患疾病的未知抵抗力使他度过了难关。

因为对他来说还有更好的时机，他成功的实验即将开始。

“当我看到保罗史密斯旅馆周围的大松树时，太阳刚刚落山。不一会儿，我们就开车来到旅店门口，一群向导和渔夫正从台阶和踏台下来，许多人伸出手欢迎我们。保罗·史密斯太太的弟弟弗雷德·马丁（**Fred Martin**）是我见过的最优秀、最健壮的男子汉之一，他正准备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无疑会要了我的命，

因此我小声对他说，我病了，想被抬到我的房间里去。他把我抱起来，好像我还是个婴儿似的，走过两段楼梯，一次跨两级台阶，打开我以前住过的房间的门，把我放在床上，表情沉痛和安慰地说：‘医生，您怎么瘦得这么厉害，体重还不如一张干羔羊皮的份量。’”

首先是精神面貌的改变。“在整个旅程中，我都有着不祥的预感，对自己的病情不抱任何希望，但在我渴望的环境的神奇影响下，这些都消失了，我相信自己会康复的。”

这就是“肺结核病人的希望”吗？或者说，这更像是一种希望，由我所说的那种强大的抵抗力所产生？谁又说得准呢？他拥有这种抵抗力至少是一个事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恢复力量。

他接着说道：“当我与那天晚上到我房间来的一群强壮男人握手时，他们向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完全没想到，四十二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去世了，但我还在阿迪朗达克山脉，试着描述自己作为病人第一次来到保罗史密斯旅馆的情形。”

四十二年！快半个世纪了！必须承认，他的生活常常因发烧而中断，不过只要在床上休息几天，发烧就总是能好转和停止！还是需要承认，他是一个非常容易适应环境的极端例子；接着是运动，后来是工作，他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潜力，然后暂时摆脱发烧和不需长期卧床！

“我睡得很好，醒来时对新环境充满了希望、期待和兴趣。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名向导，我找的向导是沃伦·弗兰德斯（Warren Flanders），卢·利文斯顿找的向导是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这看起来是对他周围环境的一种正确反应，*前提是向导应该做好相应的控制措施，使自己的“向导”工作足够宽松，以适应一个病情非常严重但特别敏锐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将看到特鲁多如何安排这一理想的结果。

“沃伦·弗兰德斯早饭后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他已经用香脂树枝和毯子将船布置得‘舒舒服服’，这样我就可以躺在里面了；他还把我的步枪放到了船上，如果我的体力能跟得上，我们就会慢慢划着船到下游的克斯磨坊，看看能发现些什么。”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那是一个灿烂的六月天，天空和水都是蓝色的，树木在春天的枝叶中熠熠生辉。他描述了他如何舒服地躺在船尾柔软的树枝上，手握步枪。“我情绪高昂，忘记了过去两个月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疾病。”

从这些言语中可以明显看出，到目前为止，第二次实验取得了几乎不可思议的成功。特鲁多想出了一个计划，既可以尽情享受他内心渴望的那种运动，同时又能像任何想控制结核病的人一样，得到充分的休息、宁静和放松。

至于他所展开的冒险旅程，那些对运动感兴趣的人会想知道它的结局。所有人都会高兴地知道，特鲁多即使在射杀一只牡鹿的时刻，也坚持着他的休息治疗！“向导不时地向前看。突然他停了下来，把船转向一边。在大约两百码远的地方，我看到了两只鹿：一只公鹿和一只母鹿正在吃草。我一直没有坐起来，而是把步枪放在船边，瞄准雄鹿开了枪，那只雄鹿跳了几下，然后倒在树林边死了。”

这是一次精准的射击，也是对他自控力的伟大致敬，而他“一直没有坐起来，而是把步枪放在船边”。

接下来的几个月对特鲁多来说是纯粹的快乐，因为他逐渐感到自己的健康正在恢复，并体验到了周围环境中的各种奇迹。他的一个挚友 E. H. Harriman 大约在那个时候来到这里，与他一起分享运动的乐趣和美丽的风景。“我们在湖上泛舟，一起打猎、钓鱼、露营，度过了许多愉快而美好的夏日。我们想在哪儿过夜就在哪儿过夜。”

经过几个月这样的养生，特鲁多几乎又恢复了健康，他与詹姆斯·利文斯顿（James Livingston）一起待了三周。詹姆斯·利文斯顿尽可能像哈里曼一样对他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并与他一起参加运动和消遣活动，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健康状态良好，也可以回到凯茨基尔的 Prospect House 与妻子和孩子们团聚，他的妻子和岳父当时就住在那里。他将自己当时的情形描述为：“我被太阳晒黑了，体重增加了 15 磅，显然身体还和往常一样好，我很想再次见到我的家人，我几乎等不及要动身去卡茨基尔的那一天了。”

在一次愉快的团聚之后，他们都动身去纽约了。在那里，他竭力想让他的医生允许他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发烧又复发了，这很快就使他认识到这样做是多么愚蠢。他在明尼苏达州度过了一个冬天，在此期间他被允许“根据自己的体力量力而行，可以开车、散步和射击鸭子”，之后他“大部分时间有些发烧”，几乎和前一年一样病情严重。阿迪朗达克山脉似乎是他唯一的希望，因此“6 月初，在妻子、两个孩子和两个护士的陪同下，我来到保罗史密斯旅馆，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地方。”

他又回到了第二个实验取得良好开端的地方——保罗史密斯旅馆，他根据自身经验在体力允许范围内进行打猎和钓鱼，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优势。他说道：“近几年来，有好几次在春天的时候，我从萨拉纳克湖（Saranac Lake）被带到保罗史密斯旅馆，病重得生命垂危，对生活完全绝望了；然而，一点一点地，当我躺在大树下，整天望着湖面时，我的发烧停止了，我的健康开始慢慢恢复……又不知不觉地，高烧开始退了，体力——以及对生活的渴望——又回来了。”说到猎兔和猎狐，他说出了颇具哲理的话：“然而我发现，我不能为了得到射击

机会而走太多路，否则我第二天就会感到不适和发烧。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休息疗法的价值，后来我将休息疗法彻底和严格地应用到了病人身上。”

萨拉纳克湖

阿迪朗达克山脉和保罗史密斯旅馆的热情好客非常让人神往。特鲁多在保罗史密斯旅馆度过了几个冬天，他母亲从法国来看他，他安排母亲住在这家旅馆，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暂时离开去了岳父家；当他驾车将母亲送到 Malone 后，他就尽力带着全家一起回来，他与妻子、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护士穿过雪地，体验了最冒险的回归。他说道：“1876年11月，我的家人和我一起来到了萨拉纳克湖，从此我们就一直住在那里。”这一次搬迁变得很有必要，因为史密斯一家不得不改变他们在圣里吉斯的工作场所，特鲁多一家不得不多方寻找，最终在萨拉纳克找了一间小屋，然后就住在那里。但正如在下面的故事中可能发现的那样，萨拉纳克并不是一个糟糕的地方：“那天下午，我们卸下家具后，我记得我与狗狗‘道格’一起出去打兔子，我在猎犬前面杀死了一只大兔子，这正是后来修建纽约中央铁路车站的地方。”

“这是现在著名的疗养胜地萨拉纳克湖的发源，最开始是卢米斯 (Loomis) 医生不时地给我送来一些肺病患者，让我试试冬季气候的影响，后来我在萨拉纳克湖畔建立了两家机构——阿迪朗达克乡村疗养院 (Adirondack Cottage Sanitarium) 和萨拉纳克结核病研究实验室，这两家机构在这个国家都是首创。”

四十年来，特鲁多和他的妻子冬天住在萨拉纳克湖畔，夏天住在保罗史密斯旅馆，现在在普拉茨堡的 Fouquet House，可以在此自由地招待客人。

1876年5月，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同年秋天，特鲁多开始在保罗史密斯旅馆附近的一个小圆木礼拜堂登记捐款，并据此建造了“荒野中的圣约翰教堂 (St. John's in the Wilderness)”。他说道：“这是我一生向朋友募集资金的开始，我不断地从事这一职业，由于他们的友谊坚贞不渝，我成功地做了四十年。”因为特鲁多对他第二次实验的信心在不断增长，他越来越渴望在其他人和自己身上尝试这种神奇的结合，即休息与量力而行的工作或锻炼。

在“这个国家首创的两家机构”中，阿迪朗达克乡村疗养院可能是对结核病患者最直接的重要场所。关于这家疗养院的发展，也许在这里很难说得太多，因为它和有关的研究所仍然在发挥作用并不断发展。“荒野中的圣约翰教堂”的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教会了特鲁多募集资金。他在这个方向上发展起来的奇妙的力量使他逐渐在萨拉纳克湖畔建立了一家疗养院。“建造疗养院的想法源于我1882年在 Anstie 的《English Practitioners》(英国医师)一书中读到的内容。沃尔顿博士定期给我寄一份在西里西亚参观布莱默疗养院 (Brehmer's Sanitarium) 的报告。”因此，Brehmer 和 Dettweiler 的工作成为了特鲁多的指导原则，促使他将自己的经验与同一领域内其他人的经验结合起来。“当时，在

阿迪朗达克乡村疗养院很难为中等收入的病人安排合适的住宿，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D. W. Riddle 先生刚到阿迪朗达克乡村疗养院时病情非常严重，在特鲁多的指导下，他逐渐恢复了健康，并接受了财务主管的职位，至此疗养院项目在资金方面的事务才逐渐理顺。三十年后，Riddle 先生去世，George S. Brewster 接替了他的职位。”特鲁多说道：“1882 年夏天，我在保罗史密斯旅馆又见到了 Alfred 卢米斯医生，我告诉他由于价格高昂和缺乏便宜住宿，当时的情况在我看来太糟糕了，我来到阿迪朗达克山脉后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城市里的一些贫困病人无法获得这种机会。然后，我谈到了在萨拉纳克湖畔建造几座小屋的计划……他同意了，说他很乐意将城里向他提出申请的一些病人送来给我，他会免费给他们提供检查。”

他的第一笔捐款来自安森·菲尔普斯·斯托克斯（Anson Phelps Stokes）先生，他在乘坐后者的德洛斯（*Delos*）号探险归来时向这位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这位先生听完特鲁多的计划后深受感动，告诉特鲁多随时可以向他索取五百美元。从那时起，特鲁多“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抓住一切机会募集捐款”，捐款来得很快，有些捐款金额比较小，但有些捐款金额非常大，例如詹姆斯（James）先生“拿出他的笔，写下他的名字，捐出 2500 美元”。现在有了钱，他决定选择一个地点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他最终选择了“一小块平整的地面，我最喜欢的狐狸跑道，我和弗里茨·哈尔洛克（Fritz Hallock）在那里狩猎了很多天，那里总是能完美地躲避南风 and 西风。”他总是把各个地方的狩猎特点考虑在内，这不是很令人感动吗？他这样做也没有错。“向导给了我一个最大的惊喜，他们买下了牧师史密斯（Preacher Smith's）的 16 英亩牧场（梦寐以求的地方），并将它送给了我，使我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的。”

“深秋时节，卢米斯医生送来了第一批两名病人，她们是两姐妹，都是工厂女工；一个是爱丽丝·亨特（Alice Hunt），得了肺结核，另一个是玛丽·亨特（Mary Hunt），得了脊椎结核，现在也有轻微的肺结核迹象。”这两名病人衣着简陋且病情严重，她们被诺顿家族（Nortons）收留为家庭成员，诺顿家族是特鲁多召集起来开办疗养院的一群人，特鲁多亲自给这两名病人提供了建议和治疗，并尽可能地鼓励她们。

想想看，这两个可怜的姑娘是到达疗养院第一批病人，随后还会有更多的病人来到这里！她们的到来和免费的治疗让人无限感动！几年以后再回头看，特鲁多可以看到当时的疗养院，“那是一个长满稀疏青草的粗糙的山坡，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石头，有些高出地面四五英尺。没有人行道，没有小路！那些建筑物，一

个小的粗木板和木瓦谷仓，主楼的一侧没有油漆，没有走廊，还有一间没有油漆的小屋！”

三十年后，赫尔曼·比格斯（Herman Biggs）博士这样评价它：“医生，我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机构！”

区别在于，大多数疗养院都是按照明确的计划建造，直到完工后才被投入使用；而萨拉纳克疗养院则是随着病人的增加和资金的积累不断扩建，从一开始就被投入使用，完全是为了病人的即时利益和便利依势而建。

萨拉纳克疗养院的故事是特鲁多自己在一轮又一轮的工作中度过的人生故事。大多数人一生都在工作，但到头来却一事无成。萨拉纳克疗养院是特鲁多生活的缩影，人们在参观疗养院时会如何意识到这一点呢，这真是令人好奇。在这里，他为结核病人而活；在这里，他失去了心爱的女儿查特（Chatte）；在这里，他的大儿子长大成人，结了婚，然后突然死去；在这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来过一段时间，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萨拉纳克实验室

1882年，罗伯特·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以及如何染色；事实上不仅仅是如何对结核杆菌进行染色，还涉及如何在纯培养物中培养结核杆菌，以及使用结核杆菌感染一连串动物。这项发现在新世界也是逐渐才被人认识到是真理，爱德华·特鲁多就是最早意识到这项发现的重要性的人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他看不懂德语，只能通过医学报刊上的报道来了解这个伟大的发现。“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的朋友李（Lea）先生，难过地对他说因为我看不懂德语，即使我拿到科赫的论文也没有用处。”当李先生找人来翻译了科赫的论文，并给他提供一份详尽的英文版《The Etiology of Tuberculosis》

（结核病因学）作为圣诞礼物时，他是多么惊讶和高兴呀。“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里面的每一个字……它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医学论文，肯定也是最重要的医学论文之一……在采取下一步之前，每一步都经过反复验证，而染色、分离和培养细菌等新方法的独创性对我来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但仅仅读到这些发现还远远不够。对于特鲁多这样的人来说，还要学会运用和推广这些方法，这样才能给萨拉纳克疗养院的病人带来益处。“不过，我自己就有显微镜，我决定下次去纽约的时候，我要尽我所有的努力去学习如何染色和识别结核杆菌。”我咨询了所有的医生朋友，看谁能教我想学的东西，但他们都不知道，也不感兴趣。”然而，通过皮博迪（Peabody）医生，他听说有一个人能帮助他，最后他去拜访了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教授病理学的米切尔·普鲁登（T. Mitchell Prudden）博士。普鲁登当时也许是在最重要的医学领域工作，但却面临着可能最恶劣的住宿条件，这似乎是当时大多数病理学家的命运。

特鲁多终于获得了机会拜访这位教授，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将要传授他梦寐以求的方法的人。虽然他的态度相当简短，但作为一个病理学家，他的时间总是被无数

的电话打扰。普鲁登的个性很突出，他立刻吸引了特鲁多。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一段友谊，这段友谊注定要发展下去，并在今后的许多工作中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是的，我可以去实验室，他会教我如何给结核杆菌染色……他会让霍登派尔（Hodenpyl）博士向我示范如何染色。我在长桌上找了一个显微镜和一块地方。我拿到了一份据说含有结核杆菌的样本，霍登派尔博士给我指了指染色剂的位置，并给每一步操作写了一些简单的指导说明。”因此，特鲁多配备了必要的用具。但尽管他努力工作了三天，却徒劳无功。普鲁登被他的坚持打动了，走到他身边坐下，纠正了他的错误，给他指出了正确的道路，最后，他成功了，他眼前出现了盼望已久的杆菌。那天晚上，特鲁多呆到很晚，他完全确信杆菌总是能对自己学会的方法产生反应，他终于彻底地学会了“怎样做才能保证成功”。他把这些原则牢记在心，回到了他在萨拉纳克的小实验室，那是一间紧挨着他家的小木屋。他可以用唯一确定的方法——找到结核杆菌——来发现患有结核病的人。

“当我带着新学到的知识从纽约回来时……我立刻使用自己能设计和购买的简单设备，开始在‘安妮女王’（Queen Anne）小屋里布置我的小办公室——一个12×8英尺的房间，一端有两个小壁橱。”然而，这个地方太狭窄了，他不得不在办公室之外再建了一个小办公室，这个地方就成了他的实验室，直到7年后，特鲁多的恒温器引发的一场大火把它烧毁。在这里，他的技术得到了发展，甚至还培养出了结核杆菌，这在美国还是首次实现。他说道：“我花了3.5美元买了一只小绵羊，将这只动物宰杀后，我得到了所需的血液量，多亏了纯净的空气和地上的雪，这些血液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并被立即转移到冰柜凝结。”他用获得的血清从一只豚鼠的结核腺体中制备出培养管，并将培养管放在他自制的恒温器中。大部分培养管都被污染，但有四个培养管仍然是无菌状态，直到第十八天，其中一个培养管在角落里出现了一点点生长。他以此为基础制作了幻灯片，你们可以想象当它被证明是结核杆菌纯培养物时他有多么高兴。这种培养物感染了豚鼠和兔子，简而言之，特鲁多掌握了结核杆菌的纯菌株，只要他认为合适，就可以一直使用。

“1892年12月的一天早晨，一个身体清瘦、面色苍白的男青年按响了我的门铃，告诉我他是个医生，得了结核病，想去疗养院……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爱德华·鲍德温（Edward R. Baldwin），他来自纽黑文；当我问他是什么让他认为自己得了结核病时，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使用了显微镜，所以知道自己得了结核病。”就这样，特鲁多所需要的医术高明的医生、出色的助手、亲爱的朋友和同志突然出现了。特鲁多说道：“经过多年的友好交往，经过多年的并肩工作，经过多年的身体磨难，我对鲍德温医生的感激稳步增长。”事实上，这个“身体清瘦、面色苍白的男青年”在为特鲁多服务的过程也证明了自己。他直到1947

年才去世，这是那个多产时期最后一位去世的伟大人物。在他的帮助下，特鲁多完成了络筒机，建造了小实验室，然后又建造了砖石大实验室来取代小实验室，这座砖石大实验室已知闻名于世。特鲁多和鲍德温一起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工作组合。从他们的共同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奥佩（Opie）身上仍在延续的灵感，这种灵感在艾伦·克劳斯（Allen K. Krause）的大脑中点燃，并充分地传给了阿诺德·赖斯·里奇（Arnold Rice Rich）和其他人。

不过，我们有必要回到鲍德温到来之前的一个阶段，研究一下特鲁多在小实验室里所做的几项实验，此处似乎很有必要提到这几项实验。首先有一个关于兔子的实验，这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实验。特鲁多选了第三批兔子，每批五只。他给其中一批兔子接种了自己最近分离出的结核杆菌培养物中的纯培养物，然后将这些兔子置于“可获得光、食物和空气的最佳环境”下。除一只兔子之外，其余四只兔子都表现得非常好，完全康复。对于第二批的五只兔子，他给予了相似剂量的结核培养物，然后将它们置于尽可能最坏的环境下，即把它们关在潮湿黑暗地方的一个小笼子里，那里空气不好，食物不足。第三批兔子没有接种，所处的条件与第二批兔子完全相同。第二批反应非常严重，五只兔子中有四只死于广泛的结核病。第三批兔子虽然都有虚弱的迹象，但在宰死后的尸检中没有发现结核病。这项实验使用了人类结核杆菌，实验结果非常有趣，因为结果表明悉心照料下的兔子通常会从中恢复过来，而照料不当且最差卫生条件下的兔子往往表现得非常糟糕。然而对于未接种的兔子，这些不利的环境虽然导致了它们的虚弱，却不会让它们死亡。在第二批中，五只兔子中有四只死亡，这是因为不卫生的条件下加剧了这种疾病的进展。尽管这一发现的全部意义对实验者来说尚有待进一步了解，但它清楚地表明了为什么最不富裕阶层的人患结核病时会比条件较好者更致命。正如特鲁多认为的一样，这对疗养院治疗的良好效果也有一定的影响。直到西奥博尔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把“人类杆菌”与“牛杆菌”区分开来，人们才充分认识到这项实验的更重大意义。我们还得说，如果这些兔子都接种了“牛”杆菌，无论是处于理想的环境下还是暴露在最坏的环境中，它们都会死亡。幸运的是，特鲁多给他的兔子接种了“人类”杆菌，这种杆菌引起的结核病可以在良好的条件下痊愈，也可能在恶劣的条件下恶化。

似乎在科赫发表他的结核病“治疗方法（即结核菌素）”之前，特鲁多就已经制造出了结核菌素，当然最后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并不能治愈结核病！他说道：“我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意识到用杀菌剂直接破坏组织中的细菌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提议，受巴斯德关于炭疽病、鸡霍乱和狂犬病的研究启发，我试图用死细菌在动物身上产生免疫力，或者使用从已经过滤了杆菌的液体培养物中提取的物质进行预防性接种。早在 1890 年 11 月 22 日，我就在《New York Medical Record》（纽约医学记录）上发表了这些工作成果，详细描述了所做的实验，提供了我得出的结论，即死细菌和结核杆菌液体培养物中的可溶有毒物质都不能保护兔子和豚鼠免受后续接种的侵害。”尽管科赫在 1890 年 8 月宣布发现了一种“治疗性”物质，但直到 1891 年 1 月才公布了他制造结核菌素的方法，因此特鲁多抢先一步，而且科赫后来才发现这种物质作为免疫制剂的价值微乎其微。艾伦·克劳斯曾说过，特鲁多发现了结核菌素及其在产生免

疫力方面的相对有用性，这确实比罗伯特·科赫的发现更伟大。然而，这样说的准确性还有待商榷。必须承认，科赫是发现、命名、描述这种物质的伟大研究者，尽管他在结核菌素的治疗效果甚至免疫质量上得出错误的结论，但他还是结核菌素的发明者，结核菌素现在已经被用作检测人或动物体内是否存在杆菌的最微妙的方法，然而，在给科赫鼓掌时，我们承认特鲁多大约同时发现了一种物质，现代研究表明它与结核菌素性质相同；发现了这种物质后，弄清楚它作为免疫制剂的价值很小，就没有对它做更多的研究。这虽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但很难使他获得科赫在深入研究和深刻思考“结核菌素”后所获得的地位，而科赫所称的“结核菌素”这个名称到现如今仍被我们沿用。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特鲁多的工作呢？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说他是一个天才。他像天才一样认识到了结核杆菌感染人体的真正意义；它具有持久性，它可以形成相对或绝对疾病；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产生一种限制或破坏生命的状况，它对休息的适应性，以及它对过度劳累的致命反应。他还像天才一样逐渐通过自己的病情摸索出如何控制这种疾病，并建立了一个组织帮助其他病例控制这种疾病。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他对萨拉纳克实验室的发展和他对科赫发现的推广描述为天才的工作；也许，这不是大师的至高之作，而是真理事业中信徒的非凡美德。

艾伦·克劳斯谈到了阿迪朗达克乡村疗养院与所有其他疗养院的不同之处，并补充道：“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创始人是一位科学家，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克劳斯说，他的名字“将被用来向年轻医生和老年人展示医学丰富人性的模式和模型”。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然后，特鲁多在萨拉纳克度过了一个收获颇丰的晚年；他住了下来，看到他所选择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小镇，到处都是村舍，结核病人可以在一个被认为是治疗方面最具权威的人附近寻求庇护。疗养院也发展起来了，现在成了接待和管理适宜病例的活动场所；在劳伦森·布朗博士的监督下，他建立和指导了这样一个机构，并因他的智慧而屡获殊荣。谈到他第一次来到保罗史密斯旅馆的情形时，特鲁多说起了帮助他入住的向导和运动能手，他说道：“我完全没想到，四十二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去世了，但我还在阿迪朗达克山脉，试着描述自己作为病人第一次来到保罗史密斯旅馆的情形。”

但是一切都会结束！1915年11月15日，特鲁多卸下了为他人服务一生的沉重负担，给美国医生留下了如何管理和如何治疗这个人类最可怕敌人的关键知识。美国医生们已经采纳了他的建议；如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像美国那样对结核病患者“管理”和治疗得那么好。